

贵邦或蝶夷：江户后期文人的 “征韩”论调与壬辰战争重塑^{*}

吴 留 营

内容提要 江户幕府初期，日本期望以新面目获得朝鲜的认可，以缓解壬辰战争后被东亚世界孤立的局面。而两国恢复交聘以后，特别是在江户后期，日本文人再次将朝鲜来使视为朝贡，难掩竞胜之心。古贺精里父子等文人既从壬辰战争中认识到外侵之害，又不断萌生俯视朝鲜的意识，乃至重新勾绘丰臣秀吉的征韩之路，在文学想象中书写未遂的兼并行为，这种对征韩之“正义性”的建构是日本中心式“华夷秩序”的要目之一。通过古贺侗庵等人对壬辰战争的重塑，可以看到江户后期文人从攘夷到开国、从佐幕到勤王的思想变迁。

关键词 壬辰战争 朝鲜通信使 古贺精里 古贺侗庵 征韩论

古代朝鲜与日本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交往既久，和战有时。日本战国时代末期，丰臣秀吉举兵侵朝^①，颠覆了旧有的朝日关系，且因明朝的涉入，此战极大改变了东亚政治气候，影响深远。朝鲜作为主战场，劫后一蹶不振，而丰臣氏人亡政息，日本旋即进入江户时代。新生的德川幕府希望获得他国认同，致力于重建朝日关系，朝鲜王朝欣然同意，以便为恢复国力赢得时间，两国由此往来不绝，维持了两百余年的和平局面。在此期间，朝鲜先后12次派出使团赴日^②，其笔谈文献与唱酬诗歌成为后世学术研究关注的宝贵遗产。当然，此类文献也有可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汉诗史”（19ZDA295）与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基金的阶段性成果。

^① 对这场1592至1598年由丰臣秀吉挑起的东亚战争，中、韩、日三国称谓不一，中方多称万历朝鲜之役，朝方多称壬辰倭乱，日本则称文禄庆长之役。为行文方便，本文以壬辰战争统称。

^② 前三次使节团称作“回答兼刷还使”，今日学界往往统称其为“通信使”，本文依之。

能“失实”^①，因而需要将来自东亚各国的更多资料纳入考察范围再行判断。

日朝两国人员在交往中取得的历史功绩难以磨灭，但交流过程中双方的争锋乃至齟齬也普遍存在。在反复较量中，朝鲜一方被认为“鲜俗狡狴”“妄自尊大”^②，日本也给对方留下了“倭情之狡猾，万万痛恶”^③的印象，而这些摩擦的背后是文化正统地位之争。1811年朝鲜最后一次向江户日本派出通信使^④，此时双方显然已察觉到历次交聘所积累的一些问题，并试图规避。有学者认为虽然“双方照例免不了琐细的争吵，但两国使节毕竟顺利致送了礼物，也交换了国书，算是有惊无险，不辱王命”^⑤；但笔者以为，其中的争执不容忽视，这些或明或暗的风险在江户后期愈演愈烈，甚至预示了明治时代日本的“征韩论”。

有学者认为，江户时代的通信使制度在1811年已逐渐失效。^⑥的确，1811年以后朝鲜王朝和日本幕府都不再看重朝鲜通信使的作用。^⑦对于这一现象，有必要回到历史语境中进一步探讨。实际上，先后12次的通信使行并未达成理想的外交关系，有时甚至激化了两国的矛盾。如果说1764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⑧，那么1811年则是两国交聘中最为暗流涌动的一次。古贺精里是这次交聘的主要人员之一，他的儿子和学生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以他们的著述为切入口，或可一窥当时日本文人之思想动态乃至东亚变局之崖略。

一、笔谈话题的管控与难以绕开的壬辰记忆

1811年的朝日交聘^⑨是唯一一次在对马岛举行的“异地聘礼”，也是一次迟到的“延期聘礼”。此前双方经过十余年反复交涉，拟定了作为共识的《通信使

① 详见张伯伟《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华书局，2017年，第234-269页。

② 松崎復《懋堂全集·卷二十三·接鮮紀事》，東京：崇文院，1926年，第1a页。

③ 蔡济恭《樊巖集·卷三十一·請議聘差倭責論還送啓》，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36冊），首爾：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年，第32页。

④ 朝鲜使节团下一次赴日是1876年，此次赴日使臣改称“修信使”。这时两国关系乃至东亚格局已经发生巨变：明治维新数年后，1875年日本“云扬号”军舰入侵朝鲜，两国签署《江华条约》，朝鲜陷入殖民地化进程。

⑤ 段志强《东槎录解题》，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0页。

⑥ 详见三宅英利《近世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鮮半島》，東京：朝日新聞社，1993年，第115页；文嬉眞《前近代における韓国の日本認識：通信使がみた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博士論文，1998年，第36页。

⑦ 详见徐东日、金禹彤《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海行总裁〉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页；金文植《조선 후기 통신사행원의 對日 認識》，载《대동문화연구》2002年总第41期，第125-165页。

⑧ 张伯伟认为1764年朝日官员的唱酬笔谈是汉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日本方面对朝鲜乃至中国文学日渐轻视（详见张伯伟《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第114-131页）。

⑨ 1811年是辛未年，故下文将此次交聘略称为“辛未交聘”。

节目讲定》，其中强调“两国书迎送仪节，彼此一同事”，“两国使臣相见礼，彼此一同事”，并特别指出“行中之人，各别申飭，毋得彼此相争之事”。^①在双方各自以华自诩的状态下，保持对等姿态尤为重要，而“毋得彼此相争之事”既透露出往届交聘中的交锋，也体现出此届使团试图规避矛盾的努力。

由文人（而非武者）主导两国关系，本身是基于和平的愿景。《通信使节目讲定》特别提及“能文能书之人”的地位，即体现此意。古贺精里是江户幕府昌平黉教授，位列“宽政三博士”，而在1811年对马岛迎聘之际，“三博士”中的柴野栗山、尾藤二洲或去世或病退，古贺精里作为辅佐大学头处理学政的儒官，成为与大学头林述斋偕行迎聘的不二人选。^②接此大任的古贺郑重其事，与门下弟子一起查阅前代文献，拟定应对之法，今所存两册《韩聘琐记》即可见其良苦用心。该书记载显示，古贺与弟子详考两国历代公私书翰往来、笔谈用语，并拟作问答之语，以求合礼而无咎。交聘完成后，古贺又将双方笔谈之语、唱酬之什辑为一卷，题为《对礼余藻》。两年后，古贺精里第三子古贺煜（号侗庵）为该集撰写跋文，文中痛斥德川时代以来日方人员接待韩使时的“好胜之心”：

国初以来，接伴韩使者，遗文具存，历历可睹。源君美及徕门诸子，由此其选也。煜间尝翻而阅之，每恨其好胜之心，炎于中而溢于外，或以我之强，侮彼之弱；以我之大，蔑彼之小；以我之丽藻曼辞，凌暴彼之枯肠短才。是以么麽夷人，不肯降心以从，动以不肖之语相加，纷呶弗已，宾主揖让之礼扫地。其辱国体，貽笑外夷何如也。^③

古贺侗庵把曾参与迎聘的新井白石（别名君美）、荻生徂徕门下弟子都作为批驳对象，对他们在两国交往场合恃强凌弱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斥为斯文扫地、辱没国体之举。白石与韩客之笔谈于今尚存，若以侗庵之语验之，不无可证，如在《江关笔谈》中，朝鲜通信正使赵泰亿以清代天下皆左衽、独朝鲜不易冠裳而自得；新井白石则泼上冷水，指出朝鲜冠裳不过因袭明代，与周礼之制相差尚远，

① 详见柳相弼《东槎录》，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293页。

② 昌平黉亦称“昌平坂学问所”，是德川幕府直辖的学术机构，其长官称“大学头”，由林家世袭。宽政年间（1789—1801）朱子学学者古贺精里、尾藤二洲、柴野栗山曾于昌平黉执掌文教工作，故并称“宽政三博士”。

③ 古贺侗庵《侗庵初集·卷九·对礼余藻跋》，东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写本，出版时间不详，第429a—429b页。本文所引江户写本文献未标明具体年份者，均为出版时间不详，不再另注。

进而不无挑衅地声称，朝鲜与琉球免于依照清制变发易服，“有假灵我东方”，也就是说，朝鲜与琉球得以幸免，是由于受到日本庇护。^① 为避免冲突，朝鲜使者并未回应此语，而是转移了话题。再结合白石主导的修订交聘仪礼的过程，可以发现，无论在正式条文还是在私下与韩使的交流中，白石都明显表现出日本优于万国的本民族中心意识，言辞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② 这种做法对日本文人而言似乎是“不辱王事”，但实质上无益于两国关系。注意到这一弊端的古贺侗庵以前人之失反衬其父做法的可贵，称“家君有鉴于兹，及接韩使，卑以自牧，不敢有凌加。试阅斯编，绝无虚喝夸诞之语、炫多斗靡之作。是以彼亦感悦欣慕，无敢枝梧。朝廷之威，不待振耀而自尊；二国之好，不假申盟而愈固”^③。不过，古贺精里父子果真践行了这一理念吗？

古贺父子认为新井白石等人的对韩策略不足为训，致力于建构新的范式。在他们看来，曾给朝鲜带来极大创伤的壬辰战争自然应该避而不谈，以免呈现我强彼弱的姿态；然而这一话题事实上难以绕开。被掳至日本的朝鲜人和陆续到访的通信使，客观上不断唤醒日本社会对壬辰战争的记忆。^④ 早在1711年第八次通信使赴日之际，日本武臣尾见正数便曾主动引出此话题：“万历中丰臣秀吉窥于大明，路依于贵国，终与大明不相和。虽至大清未通，唯每岁商舶至肥前州长崎而互市耳。”^⑤ 单就这两句来看，尾见氏并非有意挑衅，似乎还意含愧疚。他称朝鲜为“贵国”，以“大明”“大清”称呼中原王朝，显得谦卑有礼，易为韩人接受。尽管如此，朝鲜制述官李磻仍回应称“我国通日本盖久矣。壬辰之变出于不虞，痛哉痛哉！顾后通聘修好，一如前日，诚交乎岂非两邦之幸乎”。此话中不无指责：朝鲜长期交好日本，甚至不设防备，却遭到意外袭击，令人痛心。但往事毕竟已隔百年，身为通信使的李磻仍将话题转回现实，呼吁珍惜当前通聘修好的局面，其言看似平常却又意味深长。有鉴于历史教训，朝鲜使者“总是试图事先就杜绝日本对朝鲜的武力挑衅”^⑥，当然这也是使者通聘修好的应有之义。

① 详见新井白石、赵泰德等《坐間筆語（附《江閩筆談》）》，京都：八文字屋正兵衛，1789年，第6b页。

② 详见于泳、林范武《江户“正德”年间朝鲜来聘仪礼修订策略解读》，载《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6期，第86-96页。

③ 古贺侗庵《侗庵初集·卷九·對禮餘藻跋》，第429b页。

④ 韩国学者崔官也认为壬辰倭乱是江户时代日本人无法抹去的记忆（详见崔官《壬辰倭乱——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金锦善、魏大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⑤ 林樵等编《通航一覽·卷百十·筆談唱和等（正德度）》，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年，第295页。

⑥ 徐东日、金禹彤《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海行总裁〉为中心》，第23页。

然而，尾见氏意犹未尽，又称：“贵国书《经国大典》《海东诸国记》《东国通鉴》等，阙日本事迹，亦传闻之讹不少。《惩毖录》《平壤录》等又阙其事实，皆详于《太阁家谱》《丰臣实录》《庆元记》《朝鲜征伐记》《西峰今按》等书也。”话题仍未离壬辰战争，可见尾见氏似乎对此战念念不忘。此外，他声称朝鲜史书对壬辰战争的记述或缺漏或不实，这已上升到价值观乃至政治立场问题。李磻在笔谈中对此并未表露真实感怀；但在百年后的《韩聘琐记》中，古贺精里的门人指出了尾见氏所言不妥。《韩聘琐记》援引上述笔谈文字，痛加批驳：

熟察正数之意，似以丰王征韩之事欲夸彼者也。夫壬辰之役，无名之师，暴师黩武，非我美事。今聘使之至，为好会也，彼宾我主，宜待之以敬礼，岂以彼所讳之事播扬之乎？且当时两邦交战之事迹，我事详于我书，彼事详于彼书，一得一失，未可概论，况《惩毖》《平壤》二录皆彼中实录，何遽可废弃乎？而所举我邦典籍，寥寥晨星，挂一漏百，祖足示陋耳。^①

这段文字出自古贺精里弟子樋口光大之手，可以说深合其师之观点。文中认为丰臣秀吉发动的壬辰战争是穷兵黩武之举，师出无名，实不应该引以为荣，此外还承认并充分肯定了《惩毖录》《平壤录》是朝方关于壬辰战争的实录，体现出有识之士的冷静客观，可谓难能可贵。相形之下，尾见氏如数家珍地罗列日方关于壬辰战争的寥寥几部史籍，则显得不自量力：壬辰战争中，朝方文人特别是中上层文人参与始终，所成《惩毖录》等文献传播至日本，亦为多数知识人所信服；而当时日本尚武轻文，壬辰战争中日本文人随行的情况并不多见，战后虽有数部军记物语，也多是“颂祖德”之类的粉饰作品，且愈演愈奇，堪称信史的文献则乏善可陈。古贺精里及其弟子对这一问题自然了然于心。

二、《韩聘琐记》与古贺精里的矛盾言行

《韩聘琐记》是古贺精里主导或授意弟子们编纂的。在该书卷首，精里写有按语，叙述了成书缘起：

^① 详见古贺精里等《韩聘琐记·乾册·擬問》，東京：日本宮内廳書陵部藏写本，第22a-22b页。

韩人问答书上木数十种，而我谈富岳，则彼以金刚压之；我问其广袤则以二万里诤之，不殆于儿女迷藏之戏乎。邦儒多堕其窠臼，而白石为甚。余闲中举其语或能惑人者，使草场、樋口二生驳之。非敢据摭前辈，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欲鉴旧辙不复蹈耳。^①

基于古贺氏所谓的迎聘待客之道，壬辰战争似乎不应再作为话题出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古贺精里一方面主张避谈此役，另一方面却又不断重提。《韩聘琐记》在拟答部分以朝鲜使者的口吻问道：“幕下之灭丰臣氏，盖为民克残诛暴之举，而兼似为我东华复讐，今其种姓有存者否？”该书预设了多种问答情境，而对于壬辰战争这一话题也主动拟好答案，以备不时之需。该问题所附答语云：

丰臣氏穷兵黩武，残害万姓，天怒人怨。幕府虽用干戈，其实天命人心之所归，有不可得而辞者。若夫为贵邦报讐，则绝无之事。武王伐纣，非为九侯报讐；汉高诛暴秦，非为六国报讐，若谓烈祖为贵邦报讐乎？令丰臣氏无侵韩之举，则烈祖之征讨，无名无义也，可乎？古之圣王，诛其首恶而宥其胁从，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烈祖能体是意，故不绝丰臣氏后，封为列侯，至今见在。^②

该答语明确否定了德川氏诛灭丰臣氏是为朝鲜报仇，又举武王伐纣、刘邦灭秦为例，意在说明“为民克残诛暴”才是根本原因。编者在此态度鲜明地认为丰臣秀吉穷兵黩武是不义之举，诛灭丰臣氏是顺天命民心；不仅如此，答语指出德川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善恶分明、首从有别，善待丰臣氏后代便是明证。这些回答都致力于塑造德川氏正义之君、仁义之主的光明形象。但实际上 1615 年大阪夏之阵^③后丰臣秀吉子孙或自杀或被杀，其嫡系后继无人，所谓的“封为列侯”，不过是作为德川幕府喉舌的古贺精里及其弟子塑造出来的“仁政”而已。

① 古贺精里等《韩聘琐记·乾册·精里識語》，第 4b-5a 页。

② 详见古贺精里等《韩聘琐记·乾册·擬答》，第 26b-27a 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侗庵秘集》也收录了包括此条在内的《拟答韩使问》，故可知古贺侗庵应为此段文字执笔者。

③ 大阪夏之阵是江户时代早期江户幕府消灭丰臣家的战争大阪战役（1614—1615）的一部分，这场战役后，战胜丰臣家的德川家一气呵成，统一了日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据笔者管见，除了以“刷还”^①为名义的前三批使节团外，后世的朝鲜使者一般不会对日朝笔谈时主动提及此役，在使录、日记及唱和中涉及壬辰战争时也是以缅怀历史为主。而《韩聘琐记》中预设的问答是由朝鲜使者主动发问，这其实违反常态。因而与其说是朝鲜使者欲谈此事，不如说是古贺精里欲在此话题上树立一种范式，即不像前人那样与朝鲜使者辩论战争之胜负及双方著述之多寡，而将落脚点放在赞美德川幕府上。

如果说《韩聘琐记》“拟答”中出现的壬辰战争话题，还只是假借朝鲜使者之口挑起的，是一种想象，那么在1811年两国文士笔谈的真实场景中，古贺精里主动言及壬辰战争，则将其表里矛盾暴露无遗。在《六月廿一日客馆笔语》中，古贺氏谈起“讲和前”的往事，提及壬辰战争中的被掳朝鲜人洪浩然：“《洪浩然家传》，是敝妹夫之先，出贵国者。以今千载一遇，接见诸贤，故敝妹苦恳使求序跋。其事涉讲和前，恐不免唐突之罪。其不忘所自出之意，则难峻拒，姑以谋从违。”在与朝鲜正使书记金善臣谈论天文学之际，古贺精里突然转移话题至此，意欲请韩人为《洪浩然家传》作序跋。洪浩然是壬辰战争中被掳掠至日本的朝鲜人，其后人与古贺氏结亲，精里由此得到洪氏《家传》，故有此请。而金善臣回复曰：“壬辰之事，岂忍言哉！今闻之不觉泪涔涔。”^② 尽管时隔二百余年，金善臣仍不忍言及壬辰战争，足见此战给予韩人心灵创伤之深。

古贺精里致歉后，金善臣答曰：“今见《洪浩然传》，既已谈及于壬辰矣，其时我国金河西〔麟厚〕之子孙，被掳入贵邦，因住不还，冒姓河西氏，而族党繁衍云。其一族在我国，故今番信行，嘱得其实。方当两国无疑阻之日，此一事本不足讳。而问之贵邦诸贤，皆诿以未闻。”^③ 金善臣对古贺精里代妹恳求序跋一事似乎不感兴趣，不过他接过壬辰战争的话题，顺水推舟，谈起另一宗被掳朝鲜人之事。金麟厚是朱子学者，位列“东国十八贤”，其乡梓蔚山位于朝鲜东南沿海，与日本隔海相望，在壬辰战争中遭受重创。1811年赴日的通信使团多方打听战争中金家失散的子孙后代，但未获得实质性消息。金善臣指出金麟厚后裔改换姓氏后在日本扎根，而日本人却“诿以未闻”，有不诚实之嫌。

朝鲜使臣金善臣、李显相在与古贺精里等人举行笔谈之前的五月二十四日，

① 所谓“刷还”，是指搜寻并带回壬辰倭乱期间被日本掳走的朝鲜人（详见岸本美绪、宫岛博史《明清与李朝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年，第348页）。

② 详见古贺精里等《對禮餘藻·上·六月廿一日客館筆語》，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写本，第5a页。

③ 古贺精里等《對禮餘藻·上·六月廿一日客館筆語》，第5b页。

即与日本文人三宅邦有过笔谈。在这次笔谈中，李显相问道：“我国金西山麟厚阐明道之学，大有功于斯文，子孙多在贵国，以西山为姓云，想者威如博识者，必知其颠末，请为余示之。”^① 李显相是在双方谈论儒学之士时，顺便问起儒学大家金麟厚子孙的下落，并不突兀。但对三宅邦而言，被掳朝鲜人是敏感问题，他回答说“西山事余未谙其始末，宜须他日考索”。三宅氏将该笔谈收录在次年刊行的《鸡林情盟》中，此语后自注云“麟厚来居播州，为藤惺窝师。然酹庵戒余，本邦事实无小大，勿言，是以彼所问一切不具答”，透露了他受约束而不便作答的隐衷。^② 在金善臣、李显相等人与古贺精里对谈时，金氏鉴于古贺精里率先提出壬辰战争及被掳朝鲜人话题，以“诚实人”许之，再次期望获得金麟厚后人的相关信息。古贺氏则答复称：

俘虏人刷还数次，而其人留而不去甚众。若余姻亲有洪氏，所识文人有高丽氏，有高本氏（合高丽日本以为姓），其他指不遑缕。然事有系禁条者，不可公然寻访。何也？庆元刷还宜无复遗余故也，是语亦不可为外人说。碍条有罪，请以畀炎。^③

在此，精里相当坦诚地指出，虽经过庆长、元和年间的数次刷还，滞留日本的被掳朝鲜人仍然大有人在；但他不便为寻访金氏后人提供帮助，原因在于上有禁令。换言之，幕府及各藩实质上在寻访、送还被掳朝鲜人一事上多有阻挠。这已揭穿了壬辰战后德川幕府主动寻求与朝鲜复交、提出送还被掳朝鲜人的所谓“真诚”面目，因此古贺氏特意强调此语不可传之外人。金善臣不再追问，把话题转向稍微轻松的方面。他问：“秀吉果猴之子乎？”^④ 此问接近咒骂又显得无聊，古贺精里回答说只是貌似而已，至此两人便结束了壬辰议题，转入书法领域。

古贺精里及其弟子反对在朝日交聘场合提及壬辰之事，但古贺氏自己却又主动挑起话题，显得前后矛盾。此举真的只是为了满足其妹请序的要求吗？参考古贺精里长子古贺焄（号谷堂）《送洪弟使小仓叙》，便可以解开此谜。古贺精里的

① 三宅橘園编《雞林情盟》，京都：出雲寺文二郎等，1812年，第22a页。

② 详见三宅橘園编《雞林情盟》，第22a页。江户幕府自1635年起实施“以酹庵轮番制”，由幕府派遣僧人前往对马岛担任以酹庵长老，负责对朝文书的起草和解读。作为迎聘使团之外的普通人，三宅邦通过以酹庵观瑞和尚的周旋才得以与朝鲜使者唱和，而观瑞对他的告诫也间接反映了幕府与对马藩的约束。

③ 古賀精里等《對禮餘藻·上·六月廿一日客館筆語》，第5b-6a页。

④ 古賀精里等《對禮餘藻·上·六月廿一日客館筆語》，第6a页。

妹夫是洪浩然的后人洪安常，无子，精里将第二子过继给洪氏，改名洪炜。1811年迎接韩使，洪炜随团前往，古贺谷堂的送行文即写于此际。文中称：

家君之在对州，与韩客唱和往复，自礼乐文章至家族故事，莫不包罗陈列也。于是以洪氏之事语诸彼人，彼必兢兢然惊、跃然喜，及其归，必喧传彼邦以为美谭。夫朝鲜洪姓，不知其几，庸詎识今无有浩然之系统者乎。或有之，则闻其先之不死兵而喜，闻其先之殉君而感，是朝鲜之荣也。^①

古贺谷堂所引以为荣的家族故事，也即洪浩然的殉君之事，在古贺氏及其门生的著述中被反复提及。洪浩然年老后请求回归故国，获得藩主同意，然而行至唐津港时，却被反悔的藩主派人追回，从此打消了归国之念。待藩主亡故，洪浩然自杀殉之，由此被塑造成忠臣典范，其子孙得以累世继承俸禄。古贺精里参考洪氏《家传》撰成的《洪浩然传》一文虽然极力渲染藩主如何救助并厚待洪浩然，但从朝鲜战场上“我日峰公^②引军略地，民皆波迸，千里无人烟”^③等描写，亦可见战祸之惨烈；洪浩然临终写一“忍”字传其子孙^④，岂非用被掳朝鲜人的血泪写成？但这些都已被古贺精里一笔带过。他的《题洪浩然画像》以同样的词臣笔法写道：“浩然，三韩之俘，公熏沐之加诸膝而不疑，与汉武之遇金日磾同其伟度。浩然竭忠致身，亦岂遽减秬侯哉？”^⑤古贺精里以汉武帝礼遇匈奴王子金日磾作喻，盛赞洪浩然与其藩主“君臣相得之隆”，可谓罔顾人情，颠倒是非。

古贺氏引以为荣的谈资，真的能引起听者的共鸣，达到其政治目的吗？事实上，呼应者仅限日本一方，在金氏等人归国后的相关著述中，丝毫未见将洪氏在日本的“功勋”视为美谈的记载。洪浩然有国难回，由于德川时代武士身份的世袭制，他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地道的武士，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子孙的未来保障。作为被掳朝鲜人，他不得不迎合日本社会的伦理，被塑造成忠臣的代表，更被当作外来人“归化”的典型，其中的辛酸与无奈一言难尽，却根本没有得到重视。

相比于《洪浩然传》，《韩聘琐记》对壬辰战争有更明确的反思，称之为穷

① 古贺燾《穀堂遺稿抄·卷二·送洪弟使小倉敘》，東京：山城屋佐兵衛，1844年，第9b页。

② “日峰公”即锅岛直茂，古贺氏所在的佐贺藩藩主锅岛胜茂之父，曾在壬辰战争中出战朝鲜。

③ 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十三·洪浩然傳》，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寫本，第39b页。

④ 详见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十三·洪浩然傳》，第40b页。

⑤ 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十八·題洪浩然畫像》，第3a页。

兵黷武、天怒人怨之举。不过，这是古贺氏的真实态度还是应对两国交聘场合的权宜之计？古贺精里著述中提及壬辰战争之处颇多，相较于一般的征韩论者自以为的正义性，古贺氏多使用泛指一般军事攻击的“伐”而非带有道义色彩和等级意味的“征”字，如“丰臣氏伐韩”^①“丰臣氏之伐朝鲜也”^②等等。但古贺氏是侵韩战争的反对者吗？其《〈惩毖录〉后》一文可见一斑：

是时去明亡不远，丰臣氏之造攻自韩欲以取明，尤为非策。若使我养威蓄锐，少迟，应流贼内讧、满虏外侵之机，我之出师，不于辽左，而于吴会，先取金陵、两淮之地，待彼内外相弊，徐起而收鹬蚌之利，则中原可席卷而有之，朝鲜焉往。^③

可见，古贺氏并非反对侵韩，只是认为丰臣秀吉发动的战争不具备天时地利而已。在他看来日本应该养精蓄锐，待明末农民起义、后金八旗叩关之际，再出击江南，趁明朝内外交困之机夺取中原，则朝鲜不攻自下。可见，古贺精里并非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不过是自以为比丰臣秀吉谋略更高一筹的主战派而已。

当然，古贺精里既然熟读历史典籍，自然也能认识到即使等到明清鼎革之际，日本也难以吞并大陆，因为丰臣秀吉同样难脱内忧外患的困境，在“人和”方面并不占优势。他进而坦言：“当是之时，丰臣氏之祸伏萧墙之内，而徒务远略，岂非天夺之魄乎。即使丰臣氏不死十余年，不审彼此之势，而顿师于万里之海外，以我情归之兵，犯满度勃兴之锋，则辽左吴会皆无幸矣。由此言之，则和好之齟齬，亦我百万生灵之天助也。”^④壬辰战争后期，日军受到明、朝联军共同阻击，长期滞留于朝鲜东南沿海，假使再与势头正盛的满洲八旗劲旅接战，自然更无胜算。因此古贺精里最终还是承认战争的结束对日本是一件幸事。

古贺精里既批驳新井白石等前人与韩使争胜，宣称要以礼相待，却又在私人尺牍中说“尝窃叹先是聘使之来，邦儒陪奉太过，几乎启宠纳侮”^⑤，批评对韩人太过客气的做法。在两国文人笔谈场合，他既认识到不宜在韩使面前提及壬辰战争，却又主动拈出壬辰话题。他在《韩聘琐记》中对丰臣氏侵韩大加挾伐，而

① 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四·題畫為貴田維那》，第27a页。

② 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二十·浩然洪君遺烈碣》，第9a页。

③ 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十八·〈懲毖錄〉後》，第14b页。

④ 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十八·〈懲毖錄〉後》，第14b-15a页。

⑤ 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十·答玉潤和尚》，第25a页。

在私人著述中又试图优化侵略方案。赴对马岛之前，古贺精里在与友人唱和时有“西征将接鰐夷来”^①之句，以“鰐夷”称呼朝鲜；与韩客笔谈时他则口称贵邦、贵国。这种表现让古贺精里的对韩态度显得前后矛盾、表里不一。

值得一提的是，辛未迎聘之后，古贺精里收到韩客托人辗转送来的诗牋，不胜惊喜，意欲唱和而不能，他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说：“韩客拳拳于一时之晤对，致意如此，是不容不酬酢者。然令甲森严，不得答一字，是尊者所悉，口如寒蝉，事与心违，岂非世界缺陷之一端耶？”^②作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文人，古贺精里期待与韩人唱和往来，但身为儒官的他受到幕府政令的严格约束，不得擅通外人。这种“事与心违”的状况或许也是其言论互相矛盾的原因之一。

三、古贺侗庵的大国心态与征韩情结

1811年的对马岛交聘中，古贺精里及其次子得以参与，而长子古贺焄、三子古贺煜未能前往。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古贺精里提及了其中缘由：

焄儿今春叨恩试儒员，年少学浅。方此疎惕对岛之差，祭酒及朴皆发，则学院诸务不得不使试员辈翬勉担当，则带行固不宜请。如焄儿则藩法森严，求其侍奉，既难于丛口，且渠自春间被驱使，吏职闕冗旁午，最不可舍彼而趋此。业已如此，则二儿行止不由乃翁。^③

古贺焄因在藩任职，庶务繁忙；古贺煜则在林大学头、古贺精里赴对马岛之际，以儒员身份管理学院事务。二人虽然未能随团迎接韩使，但都在密切关注此事。古贺焄除了在《送洪弟使小仓叙》一文中有所涉及之外，还在送友人石川氏赴对马岛迎聘的赠别文中期许“韩人观者必曰，此惺窝之后海外君子人也”^④。古贺精里的弟子草场珮川也曾随团观聘韩之仪，古贺焄在赠别诗中写道：“尔不闻神后

① 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四·辛未閏二月復原樓分韻》，第30b页。《尔雅》提到东方之异产，云“东方有比目鱼”“其名谓之鰐”（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尔雅注疏·卷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6页）。因朝鲜居东，中国文学作品中有以“鰐城”“鰐域”称之者。在辛未交聘期间，松崎谦堂、林述斋诗中分别出现了“鰐城”“鰐域”等中性称谓。而古贺精里的“鰐夷”一词则明显有侮慢之意。

② 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十·答願海師》，第28b页。

③ 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十·答石川木蘭》，第20b页。

④ 古贺穀堂《穀堂遺稿抄·卷二·送石川木蘭序》，第12b页。

征韩如犬，又遭猿王来席卷。通好修盟二百年，还憾文场少豪隼。建勋绝域在此时，行矣草生尔其勉。”^①诗中引述两次侵韩之故事，但落脚点尚能停在通好修盟上，鼓励草场珮川在“文战”中建功立业。他在给其二弟洪炜的赠别诗中也有“已许功名探虎穴，好将文翰映鸡林”^②的诗句，寄予同样的期许。

相较于长兄，古贺侗庵对辛未交聘一事的关注度更高，在答复友人的信函、赠别友人的序文中，古贺侗庵提到自己未赴对马岛应聘的缘由：“此行也，宣命殊域，衣锦旧乡，仆岂不欲往，顾以看守无人，故家君不肯携行。仆亦不欲拂亲意，故不敢苦请。”^③“予官守在身，不得从文旆而西，讨探名山名川，深以为恨。”^④可见古贺侗庵也很期望赴对马岛参与交聘，一展才华，只是无奈于学院监守无人。侗庵的文集中还有《拟与朝鲜正使书》《拟与朝鲜记室书》《拟与韩使书》等文章，可知他虽未亲赴交聘现场，但应该参与了不少幕后工作。^⑤这几篇文章称誉朝鲜，不吝辞采，如“贵邦人文之开，远自箕子，迄今蔚然有三代流风，俊贤辈出，世不乏人”^⑥；以骈文写就的《拟与韩使书》也以谦谦君子口吻，称“对濂溪之霁月，顿觉眉伸；近叔夜之玉山，自羞形秽”^⑦。

虽然如此，古贺侗庵轻蔑朝鲜的言辞也比比皆是。古贺精里尚知两国恢复邦交之不易：“偃戈后，讲信之议，彼惩前事，深抱疑阻。玄苏和尚衔命往谕，乃肯之。”^⑧而侗庵在《送草棣芳序》中以“蕞尔三韩”指称朝鲜，在《奉送家君往对州接韩使序》中称“国初以还，韩人入贡，皆抵东武将事”^⑨，与所拟交往书信中两国平等交欢的言辞不同，在此他声称朝鲜使节是来日“入贡”。上述文章其实都是同一时期创作，因为读者的不同，使用了性质完全不同的话语，这并非偶例。在辛未交聘后一年（1812），古贺侗庵为《对礼余藻》所作跋文开篇即言：“我日域巍然峙立于海东，对岸之国以十数，除西土之外，其稍知礼义而可与交

① 古賀穀堂《穀堂遺稿抄·卷六·送草棣芳東上，時棣芳將從家君赴對州觀聘韓之儀》，第21a页。

② 古賀穀堂《穀堂遺稿抄·卷七·示洪弟晉城》，第12b页。

③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八·答高尾子浩》，第330a页。

④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五·送草棣芳序》，第229a页。

⑤ 据草场珮川《津岛日记》载，在大学头林述斋授意下，侗庵与珮川等人共同编纂了《韩聘琐记》中的“拟答拟问”（详见程永超《華夷変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國三國關係史の研究》，大阪：清文堂，2021年，第134-135页）。

⑥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五·擬與朝鮮正使書》，第202b、203b页。

⑦ 古賀煜《文江麗藻·卷上·擬與韓使書》，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写本，第29a页。

⑧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卷四·在對暇日遊以酌庵，款待移晷，還旅館，有示庵主與韓人酬酢詩，次其韻布前日之謝》，第32b页。

⑨ 古賀侗庵《侗庵初集·卷五·奉送家君往對州接韓使序》，第225a页。

使币者，独有朝鲜而已，是以庆元而还，许其入贡。”^① 此处再次使用“入贡”而非“交聘”一词，有“三代流风”的朝鲜被降格为“稍知礼义”之国。

在《对礼余藻跋》末尾，侗庵更振振有词地声称：“本邦之于朝鲜，大小悬殊，臣畜之而有余。而白石以下诸子，以好胜之心待之，是以敌国自处也，是自小而自卑也。今也家君居之以谦，接之以礼，而彼自知大国之可畏，不敢有侵轶，则亦何苦而效从前好胜之为哉。”^② 这里侗庵完全抛弃了平等交往的立场，转换成居高临下的姿态，并且明言，谦谦有礼的表现不过是想达成使韩客有所敬畏的效果。多年以后，侗庵再次为《对礼余藻》作跋，跋文称：“韩人自庆元以还，夔夔事大，不敢少萌不王之心。然不自量其轻弱，或以秦晋匹敌相视，唱酬答问之际，时露强项之态，不无可丑。”^③ 古贺侗庵所指出的韩人在笔谈、唱和时的争胜之举，确实不乏实例，但这种争胜姿态于双方皆普遍存在，古贺侗庵自身也未脱此弊。文章罔顾壬辰战后德川幕府主动修复双边关系的史实，将通信使赴日视为“事大”的朝贡之行，不承认两国如秦晋之平等，言语间透露出以本国为中心的自负。有人将辛未交聘付诸绘事，古贺侗庵为之题款，其中也一厢情愿地认为“朝鲜庆元而来，事大愈谨”^④。

辛未交聘之后，朝鲜文人辗转投递诗文于古贺精里，对此古贺侗庵声称：“独此行也，从容和恰，信心悦服，如子弟之于慈父母。迨南辕北帆参商阔别之后，犹依恋不措，远寄锦字，自表丹心，郑重笃挚，情溢于辞，实从前所未曾也。”^⑤ 他将韩客寄书致意比附于子弟对父母的依恋，可谓不伦不类，就连古贺精里本人也不曾有此非分之想，而是企盼以诗文赠答友人。可见，古贺侗庵极力凸显父亲在辛未交聘中的地位，甚至将其塑造为两国交往史上前所未有的功臣，而同时也矮化朝鲜，尽力彰显日本的大国姿态。

古贺侗庵不仅密切关注辛未交聘，还对壬辰战争耿耿于怀，数十年间多次撰写专文进行议论。早在1809年他便写下《丰王征韩论》，文中称：

以吾观之，丰王之征韩，亦秦皇汉武之侔耳。呜呼，文禄之始，群雄甫平，疮痍未疗，呻吟未已，遽驰而西征，士民弗堪，怨丛乎一身。身死坟土

① 古贺侗庵《侗庵初集·卷九·对礼余藻跋》，第429a页。

② 古贺侗庵《侗庵初集·卷九·对礼余藻跋》，第429b页。

③ 古贺侗庵《侗庵二集·卷十五·书〈对礼余藻〉後》，东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写本，第1084a页。

④ 古贺侗庵《侗庵初集·卷八·书韩人入贡图後》，第370b页。

⑤ 古贺侗庵《侗庵二集·卷十五·书〈对礼余藻〉後》，第1084a页。

未干，国既非其国，其为计也亦愚矣。然至今蝶域帖服，贡其琛币，西土惕息，不敢有异心，安知非征韩之功也。^①

丰臣氏在国内形势初定、社会经济有待恢复之际即出兵海外，最终身死国灭，古贺侗庵视之为“愚”，但同时又肯定了这场战争对征服朝鲜、震慑中国所起到的作用，认为丰臣秀吉堪与秦皇汉武并论。接下来该文花费较多篇幅，叙述了后来中日间的外交冲突：蒙古东征日本，北条时宗斩其来使；明太祖遣使赴日本催贡，怀良亲王答书拒绝，明太祖虽然震怒，但鉴于蒙古东征失利，未敢动兵；而“今清兵革之强，十倍于明，其务远略，不异于蒙古，然而未始少萌侵寇之心，吾于是乎见丰王之功大也”。^②行文至此，古贺侗庵的说法尚可视作学者的一家之言，但之后的言辞则话风突变：

征韩之举，其系国家轻重如何哉。吾犹恨当行长之始克平壤也，三韩巢窟既覆，势同破竹，诚使诸军并力一心进，遮断鸭绿江，直入辽东，则纵不能吞并西土，犹足使三韩永为附庸，明清乞和修贡，如之何。平壤既拔，稽留历月，使救兵得过江，一经催创，所得之地，终不可复。^③

在此古贺侗庵不仅肯定了丰臣氏壬辰之功，而且更进一步提出，在小西行长攻克平壤之后，诸军本应合力进击辽东，纵然不能吞并中国，至少也可以保证兼并三韩，由此可见侗庵野心勃勃。不过这也只是纸上谈兵，所言极不切实际，小西行长攻下平壤后，未继续向北推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时隔十八年，古贺侗庵于1827年再写《丰太阁征韩论》，该文与《丰王征韩论》的主要观点基本相同，但论述更为精细，致力于分析丰臣氏之败因，进而给出对策。文中称：“我军绝未悉敌情，逖听虚喝之言，以为信然，岂不黥陋可笑乎。惟其茫不谙敌之地形兵势也。”^④侗庵认为，壬辰战争中，入朝日军常常畏惧不前，原因在于被明军动辄号称数十万乃至百万的阵容吓阻，而实际上入朝的明军不过十万。此外，当时日方官兵对前方山河之险易、地域之广狭、道路之远

① 古贺侗庵《侗庵初集·卷二·丰王征韩论》，第79b页。

② 详见古贺侗庵《侗庵初集·卷二·丰王征韩论》，第80b页。

③ 古贺侗庵《侗庵初集·卷二·丰王征韩论》，第80b页。

④ 古贺侗庵《侗庵三集·卷九·丰太阁征韩论》，东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写本，第1560b页。

近曲直也都缺乏深入了解。侂庵进而又举出成功案例，论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嘉靖时期倭寇以沿海本地人为先导，清太祖战前也先使人摸清风土民情、关隘虚实。此后，古贺侂庵把话题引回壬辰战争，给出所谓的上策：

斯时上计，无如爱抚归化之民，具问其情，地势兵力，焯乎在目前。然后命二三良将提大军，以敌人向导，风驰霆击，因粮于敌，直扼鸭绿江，则三韩不劳寸兵而服听矣。更益深入，则辽东、燕京唾手可收矣。或且绝海而攻江南，亦可以夺半壁天下，而坐为孙权、刘裕矣。^①

在列述沿海倭寇、清太祖知己知彼以获胜的事例后，古贺侂庵一厢情愿地认为丰臣氏若如此也能取胜。但事实上，侵韩日军并非没有意识到以敌方人员为先导。相反，日方抓获具备弓箭、火炮等制造技艺的人员为己所用，确实也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但终难改变战局。可以看出，古贺侂庵仍对丰臣秀吉的未遂之志深以为憾。其父古贺精里曾提出先取江南而非辽东的策略，但也不得不承认和好才是最佳结局；而侂庵重提绝海而攻江南，显然选择性地遗忘了蒙古跨海东征之败的教训。

时至1828年，古贺侂庵又撰《拟谏丰太阁伐朝鲜书》。单从题目上看，“征”字换为“伐”字，已粗见其观念之变。侂庵先称颂丰臣秀吉在国内统一战争中的功勋，随后又对其发动的侵朝战争提出质疑：“师出无名，事故无成，天下莫重且大于行师。苟无名而不直，弱虏立变为劲敌。臣不知今日征韩之举，果何用为名，师之直竟安在也。”而针对有人提出的韩人朝贡不虔而应讨伐之说，侂庵又指出，皇威衰替，内乱不息，国内尚且难保忠心，遑论外夷。他进而写道：“韩与明辅车相依，韩诚小，而明则稍大。明虽主孱政秕，武备颓弛，卷土来援，必不下数十万，加以韩阖邦之众，殆且百万，乃且愤我师之曲。夫人怀敌忾之心，戮力合谋以抗我，岂易与哉？”不难发现，这里将援朝的明军数量估计为数十万，与上述《丰太阁征韩论》中明朝援军仅仅十万的说法相差甚大。是侂庵又发现了新的史料吗？文中并无线索，而且原先的数字更加符合史实。《拟谏丰太阁伐朝鲜书》之所以高估明军数量，是因为该文旨在模仿丰臣氏下属的口吻来劝阻侵韩之举，与前文支持征韩的态度发生反转。理由何在？古贺侂庵论述道：

^① 古贺侂庵《侂庵三集·卷九·豊太閣征韓論》，第1561b-1562a页。

臣恐兵缠裋蔓，海寓自此多事，渐启乱离之源，可不深长虑哉。方今弓矢始囊，疮痍未全疗，惠泽难遍。而遐方间有怀怨之氓。加旃太子懿德未彰闻，臣民崇慕之情尚浅，乘斯西师不解邦家扞隍之际，奸雄必萌问鼎之意。殿下百岁之后，裋乱之酷，将有不可胜言者。

侗庵指出战国兵火频仍，社会凋敝，若大军外征，国内将有奸雄作乱乃至问鼎犯上。随后他又援引史实以为镜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继续开边拓土，最终二世而亡；隋炀帝举百万之众三征高丽，也导致隋朝短命而终。文章结尾再次规劝道：“愿殿下加之十思，远贻孙谋，近察士民之苦。无使他人收鹬蚌之利，则幸甚。”^① 在历史上，坐收渔利的正是德川氏。而在侗庵撰写此文时，相较二十年前，天下大势以及日本国内局面已发生较大变化。侗庵重拾壬辰战争的话题，把内乱和外忧归因于“皇威衰替”，这与江户后期从尊王到勤王的思潮桴鼓相应。

四、激荡的幕末思潮与拟体文中的批评空间

在德川幕府末期^②，古贺侗庵等人反复探讨两百余年前的壬辰战争，用意已不局限于日韩之间，而是借隐喻来回应当时日本复杂的内外形势与激荡的文人思潮。侗庵在 1809 年即已论及丰臣氏征韩，而他于同时期所撰的《拟极论时事封事》和《拓疆私议》则以海防为中心议题。在写给幕府将军的《拓疆私议》一文中，侗庵提及 1806 至 1807 年俄罗斯频频扰边，日本守御失利，引发“天下臣庶莫不吁衡扼腕，自言有御侮制胜之良策”^③。这里所说的群议纷起，也包括侗庵自己。1806 年侗庵即撰有《御狄议》，面对来犯之敌，主张以攻为守。在论述中，熟读史籍的侗庵以秦欲灭六国而先伐蜀、刘备欲争中原而先伐益州等史事举例铺陈，论证先易后难、似缓实急之道。侗庵的征韩论调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其《海防臆测》中“俄罗斯获本邦人，辄加意爱养，就问我政俗。本邦异日擒俄罗斯人，亦当爱抚贍给，使乐忘叛，而审问虏风尚情伪”^④ 等语，便与前揭《丰太

① 详见古贺侗庵《侗庵四集·卷一·擬諫豊太閤伐朝鮮書》，東京：日本宮内廳書陵部藏写本，第 1647b-1649a 页。

② 关于“幕末”的时间起点，学界界定不一，本文以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为幕末起点。

③ 古贺煜《侗庵秘集·卷二·拓疆私議》，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写本，第 49b 页。

④ 古贺煜《海防臆测》（上册），東京：雕璞園，1880 年，目次第 6b-7a 页。

阁征韩论》所用策略相同。“征韩论”在幕末文人话语中重新抬头，固然是日本由来已久的“征韩”情结作祟，但也是由于当时日本面临列强环伺，扩张领地以保本土的思维逐渐从理论发展到实践，日本对周边各岛的渗透即是明证。

在各派学者群议纷起之中，尊王、佐幕、攘夷、开国等话题甚嚣尘上。值得注意的是，古贺侗庵继承家学，然不拘门户。昌平黉是“异学之禁”的主阵地，作为第二代儒者，侗庵直言：“今之尊信程朱而排异学者，其才学文章，往往不及彼。……吾才学果出彼下，吾将受教之不暇，乌能教人？”^①可见在时局迭变的形势下，昌平黉出身的朱子学者试图广泛涉猎不同思想以顺势趋时。

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水户学者所撰《大日本史》有着广泛影响，该书对外贯彻日本中心主义，对内以天皇为叙述核心，为后世的尊王、攘夷、倒幕奠定了思想基调。侗庵所受水户学派的影响亦可辨识，他对楠木正成的评价便可作为例证。楠木正成率兵勤王，是推翻镰仓幕府的功臣，但因南北朝正统之争而被北朝视为反贼。德川幕府撰史以北朝为正统，《大日本史》则力主南朝为正统，褒扬楠木氏，乃至被德川幕府禁止梓行。1822年侗庵撰《楠廷尉赞》，1831年又撰文称“矢死勤王……屡摧劲敌，以延南朝之祚”^②，推许楠木正成勤王倒幕之志。同时期昌平黉出身的松崎谦堂、斋藤拙堂也都有多篇文章盛赞楠木氏中兴王室的业绩。而古贺精里曾对《大日本史》颇有微词，与此相较，可见代际差异明显。

在水户学的日本中心主义影响下，侗庵不仅在书写壬辰战争时持日本优越论，还撰写了《殷鉴论》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展开全面批判。^③侗庵致力于拆解传统东亚华夷体系，目的并不止于建构对等关系，而是极力凸显日本在制度和士风民性等方面的优越性。在回顾古贺氏家族史时，他也有意否认中国王朝的正统性。古贺氏将自家追认为汉高祖遗脉，而侗庵认为其先祖东渡是“避乱归化”，避免了金、元、清各代的“腥膻之祸”。^④可见侗庵蔑视的何止是朝鲜，在他看来连中国都难以与“君子国”日本相比较。侗庵诗文中不称“中国”而以“西土”“齐州”“支那”代称者比比皆是。他不仅贬抑金元清，还宣称“本邦之盛，度越汉唐宋明”^⑤。他的藐视甚至上溯至春秋战国（尽管他自认的先祖汉末才徙往

① 古贺煜《劉子·卷十九·辟異學》，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写本，第81a-81b页。

② 古贺侗庵《侗庵四集·卷六·題楠廷尉遺命子正行圖》，第1874b页。

③ 详见向卿《江戸时代日本人身份建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90页。

④ 详见古贺侗庵《侗庵新論·卷一·論予家兄弟劉洪二姓，皆本於西土著姓，當各自振作以酬國恩》，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写本，第15a页。

⑤ 古贺煜《海防臆測》（上册），目次第9a页。

日本):《侗庵新論》提出“西土水攻前于丰太阁二千年,可见其俗浇薄,迥不及本邦”^①,在侗庵看来,同样是以水攻城,中国人用此计是风俗狡猾,丰臣氏用此计则是高明,这种明显的“双标”大失学者水准。总之,侗庵提及丰臣秀吉时或言征韩,或贬中国,几乎成为固定的论述模式。

侗庵之所以屡屡提及两百多年前的丰臣秀吉,也与现实中的言路闭塞有关。幕末各派学者群议纷起,引来了幕府的镇压。十八世纪末林子平因出版《海国兵谈》抨击锁国政策而招致书毁人亡,其后思想相近的学者(如本多利明)更多通过开馆授徒而非公开出版著述来传播思想。渡边华山的《慎机论》只有手稿本,会泽正志斋在1825年撰成《新论》,但迟至三十余年后始付梓。古贺侗庵早在1809年即撰长文批评幕政,但也只能自叹“了不得施于实用”^②。无路进呈,无法出版,促使文人在论说主题和文体上改头换面,采取隐喻式表达。

在此背景下,“复活”丰臣秀吉并为之正名的言论在江户后期流行一时。日本素尚武,在外患不断之际,谈兵亦成为文人习气。古贺精里提倡儒者应具备甲兵之才;古贺侗庵《文武并用论》从中国历代典籍中引证文武兼修之道;侗庵弟子中岛米华亦提到“天下之务多矣,而要其归,不过于一文一武”^③;松崎谦堂的弟子盐谷宕阴认为“文武一致,不得视为两歧”^④,甚至自谓“不愿死入《儒林传》,轻甲一联藏在家”^⑤。也是在这种强调武功的风气中,古贺侗庵开始重新评价丰臣秀吉,称其“盖世英雄”^⑥，“英概大度,为近古所未曾有”^⑦。他提出：

方足利氏之季,海南诸国未为泰西所吞并,而极脆弱易与。以尔时邦人百战之余,雄虬如虎,果能豫习知外国政俗,火器水战,夺泰西所长而用之,丰太阁征韩之旗,转而东南,指取吕宋、爪哇等国,易于疾风拂槁叶。然后设城堡、严海防,择贤将以镇其地,举良牧守以抚绥其民,扼五大洲之咽喉。^⑧

① 古贺侗庵《侗庵新論·卷二·第十九》,第39b-40a页。

② 古贺煜《侗庵秘集·卷一·擬極論時事封事》,第31a页。

③ 中島大賚《中島米華稿本·卷一·送黑龍元帥序》,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寫本,第20b页。

④ 鹽谷世弘《宕陰存稿·卷十二·經誼館揭示》,東京:武田傳右衛門等,1870年,第12a页。

⑤ 鹽谷誠《宕陰鹽谷先生行述》,收入鹽谷世弘《宕陰存稿·附錄》,第4a页。

⑥ 古賀侗庵《侗庵新論二編·卷十二·第一百二十論明嘉靖萬曆,我兵屢摧明軍,適足振作明人,使識行師之方。或以為清滅明,我與有力,洵為謬論》,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寫本,第58b页。

⑦ 古賀侗庵《侗庵新論·卷二·第十一論人相與切磋則才智自生,室町季世可以考見》,第23b页。

⑧ 古賀侗庵《侗庵新論·卷九·第八十四論與支那通使聘有益有損,其師支那自足乎己,不求修攘之上策,則尤為大失》,第14a页。

此时西方舰船频频叩关，日本自顾不暇，但也正是在列强环伺的危机中，以侗庵为代表的幕末文人开始追怀历史上的强人政治时代，更期望开拓领地以捍护本土，逐渐强化了对外扩张的野心。青山延光《题丰太阁画像》亦称“既平海内，又征海外，古今唯公一人。……方今夷狄猖獗，边境多事，天下乃始思公”^①。

曾参与辛未交聘的儒学者松崎慊堂于1834年得到《长江天堑图》，在所作题跋中既考订该图由来，又话锋一转，为丰臣秀吉献策，并慨叹此图生不逢时：

率数万军南伐，先依是图，自扬子江口入，直据金陵。截断江浙，如振坠叶耳。彼江浙者，燕云之所仰以为命。江浙既得，燕云胆落，于是使数十猛将如小早川、加藤、岛津、黑田诸公者，一路自朝鲜以冲其心腹。朱氏之灭不待闯贼，闯贼之剿不待于爱新觉罗氏，而皇图之大无内外者。^②

慊堂文中的先取江南说，未出古贺氏之外。松崎慊堂从学于林家时，古贺精里亦来昌平黉授业，二人实为师生关系，慊堂《送古贺先生序》一文可证。在水户藩参与修史且主持学政的青山延光亦有《丰太阁论》，从“尊王室、振皇威”的角度肯定丰臣氏征韩，且在结语处称：“爱新觉罗氏之并吞明国，威毒亦甚，彼岂不垂涎于我，然畏慑敛手，不敢噬啗者，太阁之力也。”^③此说也与侗庵《丰王征韩论》如出一辙。青山延光《丰太阁论》在文坛备受赞誉^④，在明治时期被选入作文教材。此外，藩校出身又任教于藩校的儒者土屋凤洲也有《论丰太阁》一文，文章洗刷了丰臣氏穷兵黩武的负面形象，将其侵略朝鲜的举动阐述为翊戴天皇、开疆拓土的忠臣所为。针对丰臣氏的最终失利，凤洲论称：“举海内兵直指江南，则不出数年，而四百余州毕举矣。四百余州举，则三韩不战降矣。惜乎公策不出乎此也。”^⑤无论是策略还是口气，均与古贺氏父子之文呈前呼后应之势。

不难看出，当时文人话语中的“征韩”，包含着“攘夷”“尊王”等观念。为丰臣氏正名，点破丰臣氏之失策，进而给出“优化”策略，是此类文章的行文逻辑。文章的论述情境在二百余年前，但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既为解除当下的海防危机而献计，也用以彰显论者文武兼修的素质。就效果来看，古贺氏父子虽未

① 青山延光《佩弦齋文集·卷八》，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寫本，第49b頁。

② 松崎復《慊堂全集·卷十一·題清兩江總督府緣江圖後》，第13b-14a頁。

③ 青山延光《佩弦齋別集·卷二·豐太閣論》，第15b頁。

④ 詳見青山延光《六雄八將論》，東京：愛知堂，1885年，第10b頁。

⑤ 土屋弘《晚晴樓文鈔·卷二·論豐太閣》，東京：松雲堂，1886年，第17b頁。

直接染指幕府决策，但因教授幕臣藩士子弟，实际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

为了规避现实中的忌讳，此类文章的书写策略是使用拟体。拟体或拟效体在中国文学乃至东亚汉文学中源远流长。《昭明文选》即专设杂拟一类，有注云：“拟，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①古贺侗庵等人于拟体涉足颇深。《侗庵初集》卷一即以1808年所写《与魏秀才绝交书》《拟劝信阳山人出仕书》两篇拟体文章冠首。后者写给太宰春台，春台二十几岁即辞职不仕，其所处时代早于侗庵百年，故此文亦可谓戏作，但戏谑的文体之下是庄严的内核。侗庵认为“北边有警，内外抢攘”^②，正是用人之际，不可高枕妥卧，可见该文与古人对话，却直指现状。侗庵同年所作的《睡乡记》声称，在睡乡中“庸奴可以媲侯王，丐人可以变富子。……虽不能久保而有之，亦足以取快一时”^③。而拟体以文学想象力所建构的世界亦可谓睡乡的一种形态。此后数年间，侗庵又写作了《拟大夫种答范蠡书》《拟太子扶苏绝食书》《拟拜宰相谢表》等诸多文章，可见其沉迷于拟体创作。在收录《拟与韩使书》等骈文的集子《文江丽藻》末尾，侗庵的跋文写道“数年来经艺余暇间，以之为游戏”^④，可以理解其在虚拟的想象之中消解现实愤懑的心态。此外，同时代的文人也颇多拟体之作，如古贺谷堂《拟寄留学生晁卿》、崎崎谦堂《拟请兴学疏》、中岛米华《上执政书拟韩退之》等，不一而足。

在《拟谏丰太阁伐朝鲜书》中，侗庵通过在文学想象中向君主进谏，借“古装”亮明了自己的志向。以拟体写丰臣氏也是江户后期的显著现象，有古贺精里《拟丰臣氏讨北条氏直檄》、赖春水《拟丰公檄朝鲜文》、斋藤正谦《拟丰太阁征韩檄》、中岛米华《拟丰关白征朝鲜誓文》等作品，可见话题之盛。这些作者在昌平黉存在师友关系，他们为克服创作汉文的困难而倡文会，有月课、轮讲等教学形式，“以月之既望集鸢鱼斋，各出宿题文以求弹诤”^⑤。侗庵《拟谏丰太阁伐朝鲜书》题后即注有“文会席上”四字。盐谷宕阴既撰《丰臣秀吉论》，又令学生内田贞试作《丰臣太阁伐朝鲜论》，由此也可见该议题的传承性与影响力。

尽管古贺侗庵在早年的《丰王征韩论》等文章中为丰臣秀吉“出谋划策”，但在1828年的《拟谏丰太阁伐朝鲜书》中他转而“劝阻”征韩，这既体现了其对外立场的转变，同时也表现出对幕府的疏离态度，这是幕末文人观念随时局而

① 萧统选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三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56页。

② 古贺侗庵《侗庵初集·卷一·擬勸信陽山人出仕書》，第7b-8a页。

③ 古贺侗庵《侗庵初集·卷一·睡鄉記》，第23a页。

④ 古贺煜《文江麗藻·書〈文江麗藻〉後》，第62b页。

⑤ 古贺精里《精里全書·卷十七·文會引》，第27a页。

变换的缩影。同年在《书草场珮川〈马岛笔阵〉后》中，侗庵再次批判前代文人在交聘场合炫才夸捷的竞胜之心；在《海防臆测》中他也指出“论丰太阁兵威之强，不用之朝鲜，而吞并海南诸国，又略有東察加，可以雄视五大洲。惜失此好机会，今则惟有严备自守，不致敌侵扰耳”^①，可见其在对外关系上逐渐远离激进攘夷立场。当然，这种转向有其现实缘由。1820年代日本北部与俄国关系缓和，虽有英人南面来航，但多数幕末文人认识到其为互市而来，与俄国略地性质不同，故而观念由攘夷转向开国。结合同时期的文章可见，古贺侗庵等人对俄、英等西船来航形势保持密切关注。1825年幕府颁布异国船驱逐令，对外国船只进行无差别打击，这种逆时代而行的保守政策自然引起了开国论者的反对。

1839年发生的“蛮社之狱”事件体现出幕府对批评者一贯的严厉态度，研究“蛮学”（西学）的渡边华山、高野长英因批判幕府而最终付出生命代价。侗庵《拟论外夷互市封事》在该事件之后写成，开篇即称：“夫泄治天下者，遭非常之变，惟非常之举可以制之。……袭故踵旧，欲以寻常庸鄙之计待之，必至乎误国债事，宗社岌岌然其危矣。”^②这些批判直指幕府因循守旧的闭关政策。文中又批驳时人拒绝互市的意见，称将招致兵祸，并指出德川幕府之初并不禁互市，宽永时期锁国不过是权宜之计，如今应相时而变，且可借互市之便出洋练习水战，最终达到强兵御敌之效。侗庵另有专文题为《论丰太阁之庙当修营行祀事，决不可任其荒芜废堕》。众所周知，当初毁坏丰臣氏庙的正是德川氏。此文以康熙帝拜祭明太祖陵为例证，似在建言，但也同样隐含了对幕府的批评之意。

对外秉持日本中心主义，对内以天皇为叙述核心，这在侗庵所处的时代已然成为精英文人的共通话语。在他们看来，所谓的皇家万世一系是日本政体超越万邦的核心要素。尊皇未必一定要倒幕，但在外患频仍的背景下，“皇国”岌岌可危，幕府则闭目塞听乃至倒行逆施，下层士人因而突破等级制，绕开幕府，争抒勤王护国之志。幕府首脑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这一称谓凸显了对外属性。正因如此，海防危机的加深让人们对于幕府的摄政能力乃至其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侗庵在1809年撰《拟极论时事封事》时，以幕府将军为预期读者。该文拟向将军献策十章，第一章便是“开言路以防壅蔽”：

今以昭代之治，臣乌敢以暴秦乱隋为比，但数十年来忌讳之风大甚，光

① 古贺煜《海防臆测》（上册），目次第4a页。

② 古贺侗庵《侗庵六集·卷七·擬論外夷互市封事》，東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寫本，第2647b页。

明正大之气渐灭都尽。切言开边之非策而褫禄者有之，著书论赤狄必为边患而囚系者有之，以及北陲之乱作，斯弊殊甚，街谈巷议颇涉边事则捕下狱，因而得罪者累累相踵。^①

侗庵以先秦以来成败事例为鉴，批评幕府御外乏策、且对内极尽压制之能事。晚此四十余年，吉田松阴《感时事作》诗中亦称，“纪纲稍弛弊沓至，第一可忧是壅蔽”^②，在外患愈烈而专制愈严的形势下号召武力讨幕。纵观幕末之文人议论，可见“批评—压制—反抗”这一清晰的演进脉络。而侗庵的隐曲书写尚介于压制与反抗之间的阶段，是特殊的文学景观。当然，侗庵的策论文（拟体文）在江户时代仅停留在稿本层面，也只于亲友间和师门内部传播。如果说在幕末有所谓的批评空间，那么文学是其中相对安全的园地，拟作或戏作的写作方式让文人得以对历史事件及现实政治进行想象性重构。这是才情的释放，也是不满的宣泄。

放眼江户后期乃至整个江户时代，侗庵的一些观点显然并非原创，如对丰臣氏征伐朝鲜之战功的夸耀，早在山鹿素行的著作中即已有之；吞并朝鲜以御外侮的主张，在林子平的著述中也有涉及；又如开发属地以巩固国防的主张，与侗庵同时期稍早的经世学者本多利明曾有专书论述。1837年侗庵《读〈海国兵谈〉》一文推赏林子平呼吁加强海防的先见之明，而《海国兵谈》时为禁书，其作者林子平被幕府以“在世间引起无用之不安”为由处以幽禁^③。1839年“蛮社之狱”发生，儒者松崎慊堂曾写信营救兰学者渡边华山，反映出其时儒者们在新旧势力间周旋，与双方关系暧昧，且逐渐向幕府的批评者一方倾斜的态势。幕府禁抑的人物、观点及话题屡屡成为侗庵书稿中的“座上客”，所谓的“异学之禁”在侗庵等人活跃的年代已然面临儒学内外的剧烈冲击。

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有云，“自德川氏崇儒术，读书明大义者，始知权门专柄之非”^④。十八世纪末期德川幕府以“宽政异学之禁”排斥诸家学术，独尊朱子学，客观上培养了重名分、尚气节之风，促使尊皇思想发达，开王政维新之基，此乃幕府始料不及者。^⑤朱子学派发展至江户时代末期，不再为德川幕府

① 古贺煜《侗庵秘集·卷一·擬極論時事封事》，第5b页。

② 吉田松阴《感时事作》，收入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东京：岩波书店，1935年，第565页。

③ 详见陈秀武《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4页。

④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收入陈铮主编《黄遵宪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9年，第49页。

⑤ 详见郑樑生《朱子学之东传日本与其发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第212页。

政权寻找意识形态上的理论根据，而是向着尊王攘夷乃至倒幕的道路上疾驰。^①古贺氏历代侍奉的佐贺藩北望对马岛，南端即是长崎，可以说是东亚和西洋信息传播的前哨，而该藩最终也加入了倒幕运动的阵营。

1811年日韩交聘之际，以古贺精里为代表的精英文人认识到壬辰战争是沉重的历史包袱，应该在交往过程中绕开这一话题；然而在实际的笔谈中，古贺精里仍不顾韩人感受，率先挑起壬辰话题，为幕府歌功颂德，可见他事先虽对前人的好胜之心有所检讨反省，但更弦易辙后仍是另一种版本的高傲姿态。表面上看，易地交聘远离双方的政治中心，省去了觐见之礼，双方更为对等，政治意味淡化，文化交往的功能加强；但实际上易地交聘中也并不存在纯粹的文化交往，政治因素的影响贯穿始终，即使是文人笔谈中也渗透着政治的较量。而从古贺精里父子的言行中不难窥见，这种力量趋于失衡，且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由此看来，日韩通信使制度衰退的背后，实质是两国关系的变质乃至恶化。

在江户晚期，并未身临交聘现场的日本文人也在热谈壬辰战争，意在争夺历史的书写权。塑造征韩的“正义性”，是建构日本式“华夷秩序”的一个要目。同时，古贺侗庵等人还通过重塑壬辰战争来隐喻幕末形势，这种书写策略乃至所用文体都形成了范式效应，体现了以昌平黉师生为代表的精英文人在日本中心主义建构过程中的角色。相较于后来在明治时代付诸实践的“征韩论”，江户后期古贺氏等人的征韩论调停留在潜滋暗长的阶段；但这些议论不单纯是文人逞才炫技的纸上谈兵，而是折射出当时知识阶层视点“向内转”的趋势：越是外患频仍，越要先解决国内问题。以侗庵为代表的儒者们广泛涉猎“异学”新知，对内外形势持有己见，实际已与幕府貌合神离。从锁国攘夷到开国，从佐幕到勤王倒幕，观念上的转换最终演化为幕末日本的重大变局。

[作者简介] 吴留营，男，1985年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比较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语图在场：晚清东亚诗歌交流的一种路径探索》（载《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等。

责任编辑：高华鑫

① 详见陈景彦、王玉强《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3页。